



自負源於自卑 奸雄亦有心結

古今
幼
教
事

長驅直入、對酒當歌、決一死戰、名副其實、兵無常勢……看見這些耳熟能詳的成語，觀眾是否猜到今次要談論的主角？「方說曹操，曹操就到」，我們今天要談論一下曹操這位曠世梟雄。

首先，我們從外貌到家世，對曹操有個大概的了解。《三國志》並沒有描寫曹操的外貌，而在小說《三國演義》這樣描繪，說：「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用今天的計量方式，「身長七尺」實在是高大威猛；可是，漢代一尺約等於0.23米，身長七尺不過是1.61米。

這個描述跟東晉孫盛《魏氏春秋》所寫相符：「武王（曹操）姿貌短小（身材矮小），而神明英發。」《世說新語》中曹操亦自言「自以形陋」。從上文得知，曹操眼小，甚至有點醜，留着一把長鬍子，身材矮小，這個外貌身形不要說英氣瀟灑，筆者的腦袋裏還即時冒起在街道上可見的「油膩」中年大叔。

說到他的家族，曹操出生於一個宦官家族，養祖父是宦官曹騰，父親曹嵩是曹騰養子，曹操祖父曹騰作為一名宦官，為社會所不齒，袁紹討伐曹操時，漢魏間文學家陳琳在檄文中罵曹操是「贅閣遺醜」，就是說他是閹人留下的醜物。可見從外貌及家室來看，曹操並不是什麼天之驕子，儘管從小生活衣食無憂，實際社會地位卻低下，自卑感油然而生。

「個體心理學」論曹操

我們以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提出的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理論放諸曹操的情況，可見不少對應和契合之處。阿德勒認為當人們出現自卑感，會變得更自我中心、渴望權力、好鬥。阿德勒強調社會因素以及個人重新調整的重要性。他的著作《神經質性格》（Über den nervösen Charakter）提及，當自卑者在社會做出成就，就會將自卑感轉化為優越感。

因為外貌和兒時的心理傷害（社會因素），曹操需要在社會闖出名聲，從而抵消自卑的感覺。可以說，曹操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兇狠，有可能是對自卑感的撫慰。

以上只是對曹操的冰山一角的探討，他這個人物複雜非常，既是政治家、軍事家（務實、果斷），也是個詩人（感情豐富）。可是，後世常以多疑、神經質、奸猾來形容曹操，甚至在小說中把他寫為奸雄。曹操不僅要面對自身的自卑心理，還要在戰亂中面對死亡的威脅。在各種利弊、矛盾、道德和理想同時交集下，他身處的環境以及要面對的問題，身在太平盛世的我們很難想像，更遑論感同身受。

筆者對阿德勒所提出的論理甚感興趣，他本人曾於兒時受過自卑的煎熬，在成長後用自己的經歷以及專業知識讓更多人了解什麼是幼兒的自卑情結，如何防止自卑情結的滋生，希望用教育強化自我認識以及自我教導的過程，讓我們有更健康強大的心靈面對人生的曲折和坎坷。



◆ 曹操畫像。

資料圖片

梁可茵老師（學研社成員，從事幼兒教育寫、教、編達二十多年，在書海濶論中尋找方便之門，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心路歷程，現為自由撰稿人，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事。）



◆ 盧延光《百帝王圖》中的晉惠帝。

網上圖片

處世待人宜變通 方圓寬嚴皆合用

《菜根譚·前集》第51條、清刻本《菜根譚·概論》曰：
處治世宜方，處亂世宜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待善人宜寬，待惡人宜嚴，待庸眾之人，當寬嚴互存。

古文
解惑

譯文

在政治清明的時代，為人處事要方正；在動盪不安的時代，為人處事要圓通；在衰亂昏暗的末世，應當方正與圓通並用。對待善良的人，應當寬厚；對待邪惡的人，應當嚴厲；對待庸碌平凡的人，則應寬厚與嚴厲並施。

註釋

- (1) 治世：和平安定之盛世。
- (2) 方：謂品行方正、正直。
- (3) 亂世：混亂無序、動盪不安之世，與「治世」相對。
- (4) 圓：圓通，靈活。
- (5) 叔季之世：指政治衰亂，即將國破家亡之世。古人以「伯」、「仲」、「叔」、「季」排列長幼順序，「叔」、「季」排序較後，故此代指末世。《魏書·釋老志》：「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
- (6) 庸眾：平庸的大眾。《荀子·修身》：「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楊倞註：「庸，凡庸；眾，眾人。」

本篇《菜根譚》的主題，簡而述之，即是「因時制宜」。此一道理，源於《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思想。蓋陰陽各有利弊，孰吉孰凶，需視乎時勢而論，故《繫辭傳》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說明世間萬事萬物皆相對而論，隨時變化，向無絕對可言。

動靜不失其時為上策

其中，《周易》的〈艮〉卦為山，象徵靜止；〈震〉卦為雷，象徵震動。待人處事，到底用〈艮〉還是〈震〉的道理為佳？一方面，止定不動，代表謹慎與冷靜，固有其利處，故《禮記·大學》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謝向榮教授（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古今
談
心

上回談到劉禪的能力時，我說他未必有大眾所想般差，但有一人和他年代相近，同樣因能力而遭臭萬年，其「與眾不同」更是得其父及各大臣認證。沒錯，你已能猜到今次想談的就是晉惠帝司馬衷。

「肉糜問題」令人啼笑皆非

智力疑有問題
晉惠帝淪千古笑柄

晉惠帝是司馬昭之孫、司馬炎之兒子，他在位期間除八王之亂等重重大事件外，最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他那句「千古名句」。

在漢末開始到魏晉南北朝期間，饑荒時有發生。《晉書·惠帝紀》記載，有一次晉惠帝得知饑荒，人民無米煮飯，要以樹皮等充飢時，竟問身邊官員為何人們不煮肉粥吃——這就是那句經典的「何不食肉糜？」惠帝以自身條件為標準，提出如此令人無言以對的可笑意見，透露出他對底層人民生活的無知以及思維方式的可笑。後世多以這句話諷刺一些無知且荒謬的事情。因這句「肉糜問題」，很多人也視晉惠帝為冷血昏君，但其實他應被質疑的，是他的智力。

心理學上智力的定義較為抽象，且理論眾多，但普遍也認同其體現了一個人對事物及概念的理解力、解難能力、記憶力、邏輯運算、語言掌握、對知識的運用及應用等的綜合能力。智力高低直接影響到一個人能否適應社會環境，因此學術界和業界多以「生活適應行為」(adaptive behavior)去判別一個人是否需要進一步作特殊的評估。

「請槍」作答「智力測試」

晉惠帝的父親（司馬炎）在惠帝小時就對他的能力感到擔心，《晉書·列傳·后妃上·惠貴皇后》中更是記載「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為言」，是說司馬炎在惠帝小時便擔心他不够聰明，很多大臣如衛瓘及和嶠也經常因為惠帝的能力向司馬炎提建議。

到最後，司馬炎更為惠帝作了中國史上第一個有較為詳細紀錄的「智力測試」：司馬炎先以要開宴會為藉口，調走了惠帝身邊所有宮官，再以密封的方式把問題交到惠帝處，要他限時回答，但最終因惠帝「請槍」——由妻子找人代答，這才僥倖過關。

從「生活適應行為」去評估惠帝，他的確可能患有輕度智力不足。首先他言語概念不清、表達困難，如他有一次聽到青蛙叫，便問身邊的人青蛙到底是為官蛙叫還是為私蛙叫，這種詞彙及概念上的不搭配，再加上還有「肉糜」一事中他對現況的理解和掌握，都讓我們看到他智力出了問題，才會淪為千古笑柄。

不過，另一方面，惠帝能掌握書寫及閱讀能力，而且有多次記載他在情感上的表達也在情理當中，和下屬也能建立良好的關係（如稽紹等人）。以現代的標準來看，智障程度應不到中至嚴重級別，估計和現在的臨界或輕度智障程度相似。

劉國輝老師（學研社成員，在大專任教心理學十多年，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作準備。）

多慾則憂 寡慾則樂

人之心胸，多慾則窄，寡慾則寬。人之心境，多慾則忙，寡慾則閒。人之心術，多慾則險，寡慾則平。人之心事，多慾則憂，寡慾則樂。人之心氣，多慾則餒，寡慾則剛。（語出《格言聯璧·存養類》）

古文
今
品

人生在世，大概沒有誰不希望自己活得幸福快樂的，而主宰人們幸福快樂的因素，除卻外在的條件，內心的慾望也佔重要一席。到底慾望對於人類幸福而言是怎樣的角色？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爭辯不休，有豪言縱慾的，有提倡節慾的，有高談禁慾的……

多慾易招致人性扭曲

中國古代的聖賢怎麼說？在《禮記·禮運》中，記載了一段據傳為孔子說的話：「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慾、惡者，心之大端也。」這句名言對後世的儒學思想發展有深遠影響。

宋明理學家曾深入討論「存天理，去人慾」的命題，鼓吹贊同者每每被後世——尤其是近現代人——評斷為不近人情，其說法也被認為不可行。然而，宋朝理學家朱熹在其著作《朱子

《孫子兵法·軍爭》謂行軍作戰宜「以分合為變」，當中亦有「不動如山」之兵法。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味靜止不動，等於守株待兔，也絕非好事。因此，《象傳·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說明行止有時，能動靜皆不失其時，方為上策。同理，待人處世，亦無一本通書活到老之理，務須方圓自在，寬嚴得宜。

《周易》的陰與陽，代表傳統文化的道家與儒家，兩家學說雖稍有異，惟其本質皆主張做人需要圓通權變，靈活應對。就道家言，《老子》好以水的多變性比喻天道，如第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說明上德者應當效法水的善性，做到「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辦事要像水那樣，安定無為，順勢圓通；行動要像水那樣，與時遷徙，應物變化，不能只偏執於一端。

至於儒家，孔子以「因材施教」聞名，不同學生即使問同一題目，他往往也會因應學生本身的個性特點，列舉不同例子回應。孔子對不同學生的態度，也會因其自身學習態度而略有差異，有的循循善誘，有的嚴加斥責。這種教育方法，本身亦體現上引《菜根譚》的思想。後來，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張君子凡事要唯義所從，問心無愧，先求做好自身，有能力再推己及人，故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儒、道兩家的思想，雖然都講求權變圓通，但亦反映出不同的人生态度。此一差異，可從《楚辭·漁父》中略窺一斑。文中，漁父勸屈原要與世俗同流，不必獨醒高舉，屈原則表明自己志趣高遠，寧願投水自沉，也不肯玷污己身清白，同流合污。

漁父不分清濁、不辨醒醉的主張，與《老子》「和光同塵」的道家思想相類，相對屈原偏向儒家的堅強不撓精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道不同，不相為謀」，於是漁父留下一首《滄浪歌》後，就轉身離去了。

在這兩種不同思想與態度中，我們的取向又是如何？何者相對合適呢？恐怕將言人人殊，永無定論，大概就如《菜根譚》所言，要兼而取用、方圓自在、寬嚴得宜吧？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高級研究助理）